学术专论

允禵更名与雍正继位问题再探讨

吴秀良

［**摘要**］雍正帝继位后，康熙十四子“胤祯”更名“允禵”的问题，曾作为持雍正继位“窜立说”学者们的一个有力证据。其实他们的“求证”只不过是利用“次等史料”来证明了十四子的名字曾经是“胤祯”的史实，而没有能证明十四子出生后的“原名”就是胤祯。不但如此，他们对允禵更名与雍正继位问题也找不到任何关系。本文考订了解决皇子更名问题最具权威性的史料——皇室玉牒，结合康熙朝满汉融合中政治文化变迁的背景，深入与十四子更名有关史料中的语境与情境，阐明了持雍正继位“合法说”学者们根据皇室玉牒对十四子胤祯改讳允禵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而化解了他们在此问题上关于史料解读的分歧，最后也试图对他们共同遗留的“未决”问题提供答案。

［**关键词**］胤禵　胤祯　允禵　玉牒　雍正继位
［**中图分类号**］K249.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8587（2013） - 03 - 0001 - 16

一、“标的问题”

自从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清史界借着皇十四子的“胤祯改讳（允）禵”这个题目发表了一系列的“考实”的论述，以图证明胤禛（雍正帝）的皇位是从他十四弟胤祯处篡夺过来的。[①]

孟森先生是 20 世纪创立雍正“窜立说”的学者（简称“非法派”）。在《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②]一文中，孟森开宗明义的主张就是：“康熙末年，诸王大臣所默喻上意，知为将来神器之所归者，乃十四阿哥胤禵。”根据这一个没有证明的先入观，孟森的猜测是阿布兰私以“玉牒缮（底）本与隆科多收藏在家”而遭到弹劾之故，可能是因为玉牒中含有胤禵被立为皇位继承者的暗示（“或即于玉牒中获有圣祖暗示之意”）。[③]实际上，孟森从未看过北京故宫珍藏的康熙朝玉牒和宗人府档案；因此他对玉牒的性质和功能存有严重的误解。因为玉牒不是遗嘱。它只记载过去，不涉及未来。在史学方法上孟森还认为雍正随意篡改了清廷内部的资料而企图掩盖他

［**收稿日期**］2013 - 05 - 02
［**作者简介**］吴秀良（1929—），男，美国波士顿学院荣休教授；silaswu@ gmail. com

① 严格说来，雍正的兄弟们避讳改名并不是他的意愿，乃是当初被他任命为总理事务的八弟胤禩（廉亲王）、十三弟胤祥（怡亲王）和隆科多（理藩院尚书）等“王大臣”提议把他兄弟们名字的第一个“胤”字改变。他起初“不允行”。但是王大臣“援引往例，陈恳再三”，所以他才“不得已而许之”。至于把“胤”改为“允”也不是他主动提出，而是接受胤禩的建议才决定的。见雍正八年五月十五日上谕，载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25 辑，1978 年，第 555 页。

②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中华书局，2006 年，第 383 页。

③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 408 页。

“夺位”的劣迹。孟氏这个“假定”实在“大胆”；然而在“求证”上相当“粗心”。

继承孟森“窜立说”并大力加强的学者首推王钟翰和金承艺。当他们认识到“改十为于”的传说不能自圆其说后，就集中在“改祯为禛，实属易易”① 的理论架构上。他们的史学方法是从中外史料中找出十四子的“原名”为“胤祯”，而后声称“允禵”是雍正帝从后者篡夺皇位后给他改的新名，以图掩饰他继位非法的秘密。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国策，清代的皇室玉牒，作为北京故宫珍藏的清朝档案重要的一环，也对外开放了。笔者于 1980 年秋天获准进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简称“一史馆”）去研究康熙和雍正朝的玉牒；接着又有南开大学的冯尔康和在日本任教的杨启樵先后于 80 年冬和 81 年春获准进入一史馆查考玉牒。

冯尔康是我们三人中首先发表“允禵玉牒易名”论文的学者。② 冯文的重点是：十四子出生后的“原名”就是“胤禵”；以后因为某种原因改名“胤祯”（他说最晚康熙四十三或四十四年；笔者发现实际应为四十二年），并且这次改名也反映在康熙四十五年版的玉牒里。换言之，在皇帝的家谱上从康熙四十五年十四子第一次改名后，一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底，他的名字都是“胤祯”；乃是在雍正元年，皇四子胤禛登基后，因为避讳，这个皇十四子才又一次改回原名为“允禵”。在这长达 20 年之久的期间，一切官方的文件和书籍以及外交使臣的记录上，只要提到皇十四子的时候，他的名字都应当是“胤祯”。

这里我们看见研究者要想试图为“胤祯，改讳禵”这个“标的问题”得到正确答案，就必须仰赖能够解决该问题的最关键、权威性最高的史料，就是玉牒。但是持“窜立说”的学者，因为没有看到玉牒，反而去从那些权威性远逊于玉牒的“次等史料”里去寻求答案。

杨启樵是第二个利用玉牒研究“允禵易名”的学者③，他对雍正继位的看法和冯尔康一致。他们都认为“改祯为禵”，只不过是在帝王体制下因为避讳而有的一个例行动作，与继位扯不上关系。

但是杨氏对“更名”一词和冯氏意见相左。冯氏认为既然十四子因为避讳改名“允禵”，而这个名字也就是他的原名，因此他在雍正元年改名允禵应当是“复名”（恢复原名）。杨氏虽然也承认玉牒的权威性，但是他认为显示在康熙三十六年和四十五年玉牒上胤禵之名都不是十四子的原名，他认为十四子生下来的名字就应当是“胤祯”。杨氏在这里，和“窜立说”一样，也是引用《皇清通志纲要》来支持他的论点。如何解释康熙三十六年和四十五年玉牒上的“胤禵”之名呢？杨氏的解释是，这两个版本的玉牒都是雍正命令廷臣“改抄”的，不是原版。改抄的原因是为了使十四子的名字在康熙朝的文献上根据纂修实录的规则一律改成“允禵”，以求划一。在这里杨氏也强调史料的运用和解读确实是解决分歧的关键因素。

本文的目的就是先来把持“窜立说”学者所引用的史料予以鉴定和批判，以期彻底破解把十四子的易名和雍正继位挂钩的迷思。另一面也要对合法派所引用的玉牒予以鉴定和考订，以期化解冯氏和杨氏对玉牒版本认知的分歧。最后，笔者也希望为冯杨二氏所遗留的几个“未决”问题提供答案。同时在整个鉴定和批判过程中展示笔者所采用的史学方法，特别是在解读史料时，研究者为什么应当注意那些描述康熙朝政治文化变迁过程的史料里所出现某些关键词句的语境和情境，以期避免因为断章取义而造成的误读和误解。这是我们治史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

① 张尔田：《遁堪文集》，卷 1，《答梁任公论史学书》；转引自金承艺：《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中华书局，2010 年，第 104 页。

② 冯尔康：《康熙十四子胤禵改名考释》，《历史档案》1981 年第 4 期。

③ 杨启樵：《雍正继统与玉牒易名》，见《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88 年，第 603—612 页；又见《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第 74—81 页。

傅斯年早年所倡议的“史学就是史料学”，在本文似可获得一定程度的印证。

二、王钟翰的误读

王钟翰先生不但是捍卫雍正篡位说的主将，也是反对冯尔康复名说的重要发言人。在他的《康熙敕谕抚远大将军胤祯档》一文中更有一节以“胤祯的命名问题”为标题的讨论。① 其主旨就是为了证明为什么他“不能苟同冯尔康的复名”说。② 王氏在文中说：

> 康熙的第十四子，原名胤祯，康熙《御制文集》中有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三月初十日谕宗人府云：“兹值复立皇太子之日，胤祉、胤禛、胤祺俱著封为亲王，胤祐、胤□俱著封为郡王，胤禟、胤祹、胤祯俱著封为贝子。”此为现存清代官书中载有皇十四子原名胤祯之仅可考见者。

其实，这道上谕不是“仅可考见者”。胤祯这个名字不但在玉牒里早就存在，在满文档案里，仅仅《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中这个名字就出现过将近 200 次；还有其他呈现胤祯之名的史料（见后）。只是王氏没有看到这些史料而已。

王氏又引用皇八子胤禩的儿子弘旺所编辑（非“所著”）的《皇清通志纲要》：

> 乾隆初年弘旺所著《皇清通志纲要》亦明云：“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多罗郡王讳允祯，改讳禵”，是皇十四子的命名为胤祯已彰明昭著，固无任何可值怀疑的了。

《皇清通志纲要》是乾隆十四年（1749）的史料，其编者是 42 岁的弘旺，他是皇八子胤禩之独子，是在胤禵更名 5 年后（康熙四十七年）出生的。所以他从孩提时期就知道“十四叔”的名字叫胤祯。当他的十四叔胤祯改名为“允禵”时，他已是 15 岁的少年，当然记得改名的事。因此他在《皇清通志纲要》里注明“祯改讳禵”，乃是根据他幼年时期的记忆。编写此书时弘旺的身份仍然是“罪籍宗室”，更不可能去大内参考康熙三十六年和四十五年的玉牒，所以他的“注”本身就是错误的！

这里应指出的是，“命名”是指生下来“起”的名字，是真正的“原名”，也就是冯氏指出在康熙三十六年玉牒上的胤禵，不是“胤祯”！

接着王氏转引了金承艺题为《从“胤禵”问题看清世宗夺位》一文中的一件朝鲜史料说：

> 金教授据朝鲜《同文汇款考补编·使臣别单》所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朝鲜派到清朝贺冬至正使李混、副使李选的见闻报告，说宗人府与十四王有事置对。此事件由宗人府钦印公布过。当时的本子封面最高处，有朱笔写的“旨：胤祯削去王爵，仍存贝子”十一字。

这条史料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这种“见闻报告”的供应者用“十四王”这种词句明显是皇室以外人们所用的俗称。

第二，就时间上说，如果日期是“康熙六十一年”，那么这件胤祯和宗人府“置对”之事必定是在胤祯从军前返回后发生的。他到达北京的日期是该年的十二月初六日。胤祯和他诸兄弟是在雍正元年才改名，那么宗人府“康熙六十一年”的“本子”上用他当时还没改名前的“胤祯”又怎能算作新发现呢？这是治史者忽略时间因素产生的误解。

---

① 王钟翰：《康熙敕谕抚远大将军胤祯档》，见《王钟翰清史论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133—1148 页。

② 需注意的是，王钟翰所争论的问题跟冯尔康的立论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他所争论的是胤祯的“命名”问题；而冯氏的论证是“更名”（或易名）问题！在一史馆的宗人府档案中有“更名簿”这样的“册籍”；而没有“命名簿”这种东西。命名是指皇子生下来以后必须经过乃父康熙给他“命名”（就是俗称“起名”之意；也即文献中所说的“赐嘉名”）。冯氏的命题不是“命名”而是“更名”。

但是，王氏凭着金承艺引用的这个“外国史料”，便谓：“冯教授认为胤祯原名胤禵之说，我不敢苟同。”为了加强他的观点，王氏还说：

> 今幸存到今的这份清康熙亲笔写给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王胤祯的《敕谕档》，皇十四子的名字不但汉文本标题与文本均写作“胤祯”，而且满文本标题与文本亦均写作“in jeng”（满文译音）……这封敕书写于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之前这个月里，出之康熙之亲笔，付之皇十四子胤祯本人之手，不能说这其间有半点虚假或失误之迹象。说皇十四子原名胤祯，后改名允禵，应该说是千真万确的事，无庸置疑的了。

王氏这段话不过重复了他的误读和误解：胤禵的名字早在康熙这道“敕谕”发布前 16 年（即康熙四十二年，见后）就改成了“胤祯”；那么康熙五十八年的“敕谕”把皇十四子的名字写成胤祯还有什么奇怪呢。奇怪的是王氏没有搞懂冯氏所说的“原名”是胤禵，而他一直误会十四子的“原名”是“胤祯”！

三、金承艺的狂想

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胤禵“原名胤祯”这个错误观念上挖掘胤祯篡位证据的学者中，以提出雍正“盗名”篡位新说的金承艺先生最为著名。近年大陆一位渴慕求真的学者还把金氏历年在台湾出版的论文汇集成书，为大陆研究雍正史的学界注射了一剂“误诊”的兴奋剂。①

金氏在他《从“胤禵”问题看清世宗夺位》② 一文中声称：

（1）皇十四子，“至少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圣祖崩逝以前，他的名字不叫胤禵。当时圣祖诸皇子中，并没有一个人叫‘胤禵’。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圣祖崩逝之后不久，‘胤禵’这个名字才突然地出现了”。

（2）那时候身任抚远大将军的皇十四子“胤祯”，已经三十五岁了。一个人突然之间被抹去了真名，而又“无中生有地改成一个叫‘胤禵’的新名”。

（3）圣祖原来是传位给胤祯，但是雍正（皇四子）首先把这个名字偷来，夺取皇位后，又把这个名子改成和“胤祯”相似的“胤禛”。然而雍正的“真名”是什么，无人知道；尚待考证！

（4）“胤禵”之名为“清世宗偷天换日的杰作”；“清世宗运用帝王的权力……把所有的书籍、资料、记载中留有他十四弟原名［胤祯］的，一概予以隐没改窜；他想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让后世的人永远不知道他这个弟弟的真名”。

（5）金文的结论是：“胤禵是世宗假造的名字，而‘胤祯’才是皇十四子的真名。”

金氏引述了一些支持他“盗名”说的证据：

1917 年吴昌绶纂《清帝系后妃皇子皇女四考》一书中有：“皇十四子……允禵，孝恭仁皇后生”一行下面所附的小注“原名允祯”③。

1929 年张尔田纂《清列朝后妃传稿》一书中在“皇十四子允禵”项下一段“夹注”，也是引用弘旺的《皇清通志纲要》说“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允祯，改讳禵”。

1949 年王钟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中也引用了弘旺的《皇清通志纲要》中另外一条：“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正月初九日，皇十四子祯生。”

---

① 孟繁之收集了金承艺的十五篇文章，辑为《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一书，由中华书局于 2010 年出版。

② 《从“胤禵”问题看清世宗夺位》一文，见《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第 82—117 页。

③ 这明显是错误的。吴昌绶虽然在其“序”中说明他的《四考》是“谨依玉牒、实录、会典、通考诸书”，但是他所依据的“玉牒”显然不是康熙朝的玉牒。十四子的名字只能是康熙朝的“胤祯”或是雍正朝的“允禵”，从来没有“允祯”这样的名字！

金氏引用以上三人的依据，“都是源自弘旺写的《皇清通志纲要》”。但是弘旺顶多只能证明他十四叔曾叫“胤祯”，他并不知道十四叔的原名是胤禵。

此外，金氏还引用了清廷的“官方史料”；兹仅胪列并予审查：

1、康熙四十八年《圣祖御制文集》第三集中“谕宗人府”（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十日）（原文见前）。在这道上谕里皇四子“胤禛”的名字和皇十四子“胤祯”的名字同时出现。证明皇四子的名字确实是胤禛，不是金氏说的他的真名“无人知道”。

2、《明清史料》收录有《给抚远大将军王胤祯敕书稿》及《大将军王胤祯题稿》。这些史料中十四子的名字“胤祯”都是出现在康熙末年，完全符合玉牒的记载。它们更不能证明他在雍正朝改名“允禵”是雍正伪造的。

除了中文史料外，金氏还引用了一些朝鲜文书中“与清代官方资料相近的记载”。这些“相近”的记载，可信度不一，有的甚至是伪造的！这些“朝鲜史料”对解决我们标的问题（允禵更名）不但毫无帮助，还把问题搞得更糟。这一点在前面已有辩驳。

总而言之,金氏引用了含有“胤祯”之名的中国和朝鲜的史料,从时间上看,都是康熙四十五年以后的史料。但是“胤祯”之名既然早已明载康熙三十六年和四十五年的玉牒中,更出现在将近200 件满文奏折里,金氏实在没有必要耗费那么多的笔墨再去“证明”不需证明的事实!

简言之，金氏凭着他丰富的想象力，引用了大批的官私史料以及外国（朝鲜）史料，竟然认为他已经破解了二百年来雍正如何“偷偷摸摸”① 地把他十四弟的原名胤祯先改成胤禵，然后又把他十四弟胤祯这个名子偷来当做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又把这个名字加工成形声都极其类似的“胤禛”。金氏认为这是因为“把‘祯’改成‘禛’”，这种做法和“改十为于”的做法相比，“实属易易”!

笔者和金承艺是旧识。上世纪 80 年代金氏常把他的论文单行本寄给笔者。回想当时的反应是：这简直是金兄的狂想曲！当时笔者正在忙着别的研究项目，因此并未予以回应。如今金兄已归道山。

四、冯、杨的更名分歧

金氏“盗名”论的大作问世后，先后已经有冯尔康和杨启樵二位先生为文予以反驳，他们根据玉牒对“允禵”更名问题已经作出卓越的贡献。如果用踢足球的比喻，二位已经把球踢到球门了。不过就需要“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二位却在胤禵玉牒更名的问题上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分歧。分歧的原因也是源于对同一个史料（玉牒）版本的鉴定意见不同。

在《康熙十四子胤禵改名考释》② 一文中，冯尔康首先提到王钟翰创立夺嫡说所依据的《皇清通志纲要》。冯氏提问说：“十四子原名是否如弘旺所说，笔者认为，应予考证清楚”，接着说：“这是因为康熙十四子在雍乾之世都叫允禵，弘旺与他同朝相处，强调允祯一名，似有深意。”

冯氏认为如果要想“考证清楚”十四子的改名问题，最权威的史料应当是清廷纂修的《宗室玉牒》（简称玉牒）。冯氏查考了康熙朝历届玉牒后发现下列重要事实：

1、十四子生下来就起名为胤禵。这个名字的满汉文在康熙三十六年版的玉牒上是一致的。

2、十四子的名字在康熙四十五年版的玉牒上也都是胤禵，满汉全同。只有在登录康熙皇孙的汉文直格玉牒中出现的是“胤禛”（这里的“禛”明显是误笔。因为从它的排行位置来看，它是列在十二子胤祹之后。十三子胤祥尚未生子，不列），而在前面排行第四的乃是“多罗贝勒胤

---

① 金承艺：《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第 99 页。

② 冯尔康：《康熙十四子胤禵改名考释》，《历史档案》1981 年第 4 期。

禛”。

3、冯氏还发现十四子生下来的“原名”是胤禵（正如康熙三十六年玉牒所显示），以后因为某种原因（冯氏未决问题之一），康熙帝把他的名字在康熙四十五年玉牒编纂前一二年（四十三或四十四年）改为“胤祯”。

杨启樵在《雍正继统与玉牒易名》一文中①也认为皇室玉牒是解决允禵易名问题的最权威史料，也认定皇十四子的名字在雍正登基后从“胤祯”改为“允禵”纯粹是中国帝王政体下为了避讳而改名的一个传统运作，而与雍正继位问题没有关系。但是杨启樵不同意冯尔康的“复名”说。他认为十四子的“原名”在康熙朝一直就是“胤祯”；而“胤禵”之名所以出现在康熙三十六年和四十五年的玉牒上，乃是因为这两个版本的玉牒都是雍正朝重新“改抄”的。他认为胤祯就是十四子的原名，因此改名允禵，仅是“易名”而非“复名”。杨氏说：

> 1981 年夏天，当时还没有拜读冯先生的大作，我也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玉牒，一看康熙的部分，我就对档案馆的刘桂林先生说，这不是康熙原本，是雍正年间改修的。为什么呢？因为胤禵的名字，赫然在内。

杨氏根据他的“先入观”（即康熙三十六年和四十五年的玉牒是雍正朝“改修”的，而非原本），对冯氏的“复名”说提出五点“疑问”：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康熙为什么要为十四皇子改名？冯先生也认为这是应该弄清楚的，可是目前没有资料可以说明。”

第二，“即使要改名，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和四皇子十分相近的名字？”

杨氏先说明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康熙二十七年，十四皇子诞生的时候，他的哥哥四皇子只有十岁，没有受到大家的注意，内阁大臣一时疏忽②，取了一个相近的名字，不是不可能。可是到了康熙四十五年，一个是二十八岁，一个是十八岁，已经开始各种活动，为众所周知，替他改名的无论是康熙，或者是大臣，按常理说不会有这样差错。而且有特别需要才改名，应该比取名更慎重，为什么挑选了这个形音相似的名字呢？”

第三，“如果十四皇子原名胤禵，在玉牒中应该有反映，像大阿哥允禔一样，清清楚楚注明原名保清。雍正即位后让十四皇子恢复原名，是堂堂皇皇的，不必把这条史料毁减。”

第四，“如果十四皇子原名胤禵，弘旺的《皇清通史（笔者：史应作志）纲要》，应该说原名禵，改名祯，雍正时复名，但是他反而说原名祯，改为禵，不是与事实正好相反吗？”

第五，杨氏认为任何一个皇子改名都应当有理由，他说：“冯先生举出来大阿哥的例子，但是这个情况不一样。我们知道康熙的第一皇子生于康熙六年九月……。接着出生的是大阿哥保清……此后出生的皇子，取名都向太子看齐，也就是说上一个字‘胤’，下一个字“示”旁。这一来生存的皇子当中，只有大阿哥的名字与众不同，所以在康熙二十七年［增修玉牒的时候］，或

---

① 杨启樵：《雍正继统与玉牒易名》，见《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第 74—81 页。以下引文，具见该文。

② 实际上，内阁只是为康熙的皇子“拟名”（提供建议的意思）而最后决定权是康熙帝自己（“恭候钦定”）。康熙帝应当清楚他四子之名是“胤禛”，而他当初接受内阁为十四子的拟名为“胤祯”显然认为没有问题。这是因为在家里康熙口语是以“几阿哥”称呼儿子，而在外朝只有在正式文书（谕旨、诏书）上，他们的名字才会出现在该文书的文本里，而“禛”和“祯”的“形”和“声”都不同，不可能发生混淆。虽然康熙在御门听政时也曾用“口谕”任命四皇子“胤禛”代祭奉先殿，而起居注官“误听”成“胤祯”，但是这种错误只是出现在起居注的“草本”上，而“承旨”的大学士并没有听错，所以在内阁的上谕档里予以准确记载为“胤禛”；而根据上谕档所编纂的圣祖实录上也是“胤禛”。但是，雍正即位后情形发生了变化（详后）。这个口头“发音”的因素对作为康熙的“皇子”的胤祯和“成为”臣子的“允禵”在身份上意义完全不同。关于“皇子”命名程序，据《国朝宫史》卷 8：“其赐名之例，由宗人府奏请。奉旨后，由内务府知会宫殿监，宫殿监交内阁拟嘉名，具折呈览恭候钦定后，宫殿监知会内务府转行宗人府登记（黄册）。俟恭修玉牒载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39 页。

者稍早的时候，大阿哥也由保清改名胤禔。大阿哥改名是有特别理由的。”

杨氏不同意冯氏的“复名”说源自他和冯氏对康熙三十六和四十五年玉牒版本是不是原本的更基本问题。杨氏认为那两个版本都是在雍正朝“改修”过的版本；冯氏认为都是康熙朝的原本，因为“冯先生认为工程浩大，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没听说过修改玉牒的事”。但是杨氏不同意冯氏说法。他说：

> 我以为全部改抄是可能的……那么用什么口实来改修呢？我想事情可能是这样，雍正二年碰上了修玉牒，这个时候十四皇子已经改名为胤禵，臣下请示，要不要把改名的事由写上去，回答是：“不必了”。因为这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可是这一来不是和康熙年间的玉牒有出入吗？于是雍正命令把以前的几份也改了，这是轻而易举的事。

接着杨氏说：“总结地说，我以为康熙三十六年以来的几份（笔者：只有四十五年的版本，五十四年本不存在）玉牒都不是原本，十四皇子成为允禵是改名而不是复名。”

杨氏又曾专程到第一历史档案馆重新把康熙四十五年的“直格汉文本有关康熙诸子的几页”再一次检视过一遍，他发现“它的格子、人名（生存者用朱笔）倾向于棕色，和前后几页的鲜红色不同”，因此问说：“是否经过抽换了呢？关于这一点，还需要专家们做进一步的调查。”

不过最后杨氏仍然坚持他的看法说：“可是无论怎样，我的结论是不变的，整部改抄也好，几页抽换也好，我仍然认为康熙四十五年的玉牒不是原本，十四皇子原名胤祯，不是胤禵。”

杨氏指出他和冯氏在“复名”说上的分歧证明其根源还是一个“史料鉴定”的问题。他说：“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注重史料，一条新史料的出现，有时要把整个历史重写。”因此，他一面郑重声明说：“在雍正继位问题上，冯先生的理论和我最接近，都反对篡位，只是十四皇子复名说有分歧。”

杨氏结论说：“我和冯先生读了［同样康熙版本的］玉牒，［而结果］有相反的看法。我当然不敢说只有自己才是对的。今天实在是要向各位先生领教，怎样判断史料。有些先生也许早就对这个问题注意了。”

笔者认为，既然冯尔康和杨启樵在使用玉牒上也因为对于同样的史料的版本发生歧见；也是完全系在“怎样判断史料”的基本问题上。因此我们也应当对玉牒这个史料同样予以严格的审订，然后才能根据审订的结果去化解他们的分歧。

五、康熙朝玉牒的考订

清朝的皇室玉牒有两种“格式”。第一种是“横格玉牒”，第二种是“直（竖）格玉牒”（由“帝系”、“皇子”和“皇孙”三部分组成）。

皇二子出生于康熙十三年命名保成。其胞兄、嫡长子承祜幼殇，康熙十四年保成 2 岁（一周岁）被康熙立为皇太子时，同时更名为“胤礽”。此后他的弟辈胤祉、胤禛都以“胤”字排行，而且第二个字都必须是包括“示”字旁的单字。但是皇长子仍然保持他的原名保清。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虽然皇子的原名是汉文，但是当他们的名字送到宗人府去登记黄册时，反而是先把他们的汉名音译成满文，登入满文黄册；宗人府里没有汉文黄册。这一个特点对于我们考订康熙朝玉牒非常重要（详论见下一节）。

下面的考订是根据笔者 1980 年在一史馆查阅康熙雍正朝玉牒时所做的笔记。

（一）康熙九年玉牒

在帝系表里“今上皇帝康熙万万年”（直格）下只有 3 个“皇子”。他们都是采用汉名并以“承”字排行：1. 承瑞（墨）；2. 承祜；3. 承庆。

（二）康熙十八年玉牒

本年帝系表列了康熙的 11 个皇子。那时胤礽已被立为“皇太子”。他的名字列在中央位置，

直接写在康熙的名下。意味着他是康熙帝“一脉相传”下来的皇位继承人。[①] 其他皇子按照序齿，先右后左，轮替排列。[②] 关于本版玉牒的内容，考订如下：

1．帝系部分“今上康熙皇帝万万年”下面只有 4 个“皇子”之名；其他都是“幼龄”夭折，列在胤禛左边。

2．第二子皇太子胤礽的位置在正中；名下也未注明“由保成改为胤礽”（下面将作解释）。

3．长子的名字仍是“保清”；并未和其他兄弟以“胤”排行。

4．皇子的名字的颜色，根据“存者用朱，故者用墨”的原则，所有“存者”都应当是红色。但是笔者发现唯有皇四子胤禛（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初三日）的名字是“黄色”（以后有解释）。

（三）康熙二十七年玉牒

本版玉牒中的皇子有 13 个（到第十三子胤祥为止）。本版玉牒中的问题特多。汉文玉牒中对于皇子名字写法的混乱[③]：

1、在直格（皇子）玉牒中：第四子的名字在汉文本上是“胤禛”；但是在满文本上，满文书写的对音是 yin zheng 而非 yin zhen。

2、在横格（皇子）玉牒中：

第一子的名字在汉文本是“保清”；但是在满文本上的对音是 bao cheng 而非 bao qing。

第三子的名字在汉文本是“胤祉”；但是在满文本上的对音是 yin chi 而非 yin zhi。

第四子的名字在汉文本是“胤禛”；但是在满文本上的对音是 yin zheng 而非 yin zhen。

第八子的名字在汉文本是“胤禔”（这是错写）[④]；但是在满文本上的对音是 yin si（是正确的）。

（四）康熙三十六年玉牒

笔者发现康熙三十六年版玉牒中的问题有：

1、直格玉牒（皇子）：

第一子的名字：汉文是“胤禔”；名下有“原名保清更名胤禔”字样。[⑤]

第十四子的名字：汉文是“胤禵”；满文的对音是 yin ti（是对的）。

第四子的名字：汉文是胤禛；满文对音是 yin zhen（是对的）。

---

① 这一点对于讨论康熙五十四年玉牒的政治意义很重要，笔者另文详做讨论。

② 杨珍认为：“从有关史料看，康熙二十年（1681 年）后，玄烨才按‘胤’字排辈，为皇子命名。如将保清（皇长子）改为胤禔，保成（皇太子）改为胤礽等等。”但是根据康熙十八年的玉牒，第二子皇太子在该年已改名为胤礽，名下也未注明：“原名保成，改名胤礽”字样。不知“有关史料”为何。见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2003 年，第 153 页。

③ 这里的满文“音译”是根据当时帮助笔者阅读满文玉牒的刘景宪先生的口述记下来的。（刘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满文学者，是一史馆鞠德源先生介绍给我的。笔者谨在此对两位的热心协助表示感谢。）当时笔者用的是“Wade-Giles”拼音，现在转换为汉语拼音。虽然当时有可能听错，最好能够重新请专家予以验证，不过目前环境不允许；而且即使稍有差错，对解决“标的问题”影响不大。关于满名汉译的问题，参福格撰《听雨丛谈》（香港龙门书店，1969 年）页 118：“八旗人称母曰额娘，曰阿家，曰奶奶……皆清语。或写阿家为阿姑。盖满汉谐音。多无定字。”

④ 这里的误写是因汉文“禩”的发音只有一个 si；但是“禔”的发音有三个：zhi、ti 和 shi。编纂玉牒人员如果根据满文发音去寻找相对的汉字时，禔的第三个发音 si 和 shi 太近或满文无法分辨，因此这里的误写是可以理解的。（胤禩生于康熙二十年二月初十日，名字不在十八年的玉牒上。不然增修二十七年汉文玉牒版本时也可以按照十八年玉牒照抄无误。）

⑤ 宗室在康熙三十六年玉牒上更名之例可供参考：和硕简亲王雅布（有十四子）：第一子雅尔江阿原名“雅尔台”，更名雅尔江阿。和硕恭亲王（有六子）：第二子满都虎，以后改为“满都护”（“护”比“虎”雅）。马奇的弟弟辅国公讷默孙（有九子）：第九子雍熙名下有“原名荣富更名雍熙”。

2、直格玉牒（皇孙）：

皇孙的名字都系在父亲（皇子）名下。第一位是皇太子胤礽，其次是第一子胤禔，第三子胤祉和第五子胤祺。不见胤禛和胤禵的名字（是因为胤禵在康熙三十六年才 10 岁无子；而胤禛的第一个儿子弘晖也是该年三月二十六日才出生而不列）。

3、在玉牒最后一页有下列字样：“康熙三十六年正月奉旨重修玉牒。本年十二月内添写修完。”但是笔者发现那里夹着一个小黄纸条，上面写着“康熙三十六年黄档四号”。（证明该年皇孙玉牒是根据黄册即“黄档”。这个纸条的意义稍后详论。）

（五）康熙四十五年玉牒

这是目前一史馆珍藏康熙朝最后的玉牒版本（康熙五十四年版本不存在）。这个版本有下列几个重要问题：

1、十四子名字胤祯误写成胤禛。

十四皇子的汉名在所有汉文本和满文本玉牒里（帝系、直格［皇子］和横格）都是胤禵，与康熙三十六年玉牒相同；满文书写也同，对音是 yin ti。他的汉名只有在直格玉牒（皇孙）里误写成“胤禛”。

这个错误笔者在 1980 年 12 月 8 日的日记里曾有记载，鉴定它是“胤祯”的误写。冯尔康和杨启樵也得到同样结论。考订这个笔误很容易：（1）根据排名位置来看，它是列在十二子胤祹之后（十三子胤祥无子故未列入），顺序往上推是十皇子胤□；（十一皇子已故无子），再往上是七皇子胤祐（九皇子胤禟尚未生子；而八皇子胤禩独子弘旺于四十七年正月初五日才出生，故二人的名字都不列入）。再往上推是五皇子胤祺（六子胤祚早殇无子）；再往上推就是四皇子，玉牒上写的是“多罗贝勒胤禛”。（2）四皇子在康熙十八、二十七和三十六年的玉牒版本上一直都是“胤禛”，这里四十五年本中列在十四子位置上的“胤禛”当然是错字。

2、十四皇子的名字从康熙四十五年起（实际最晚从康熙四十二年）一直到雍正元年，他的名字无论在官书上（如康熙帝的《御制文集》）或是有他署名的大批满文奏折中（如《康熙朝满文奏折全译》和《抚远大将军满文奏议》）所使用的满名文字，其对音是 yin zheng。

康熙四十五年“帝系玉牒”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胤礽和胤祉在满文帝系里的对音是分别是 cheng 和 chi；而不是 reng 和 zhi。胤祺的满文对音是 ki 而非 qi。

																			今上皇帝康熙万万年二十九子									
胤禨	胤□	胤禶	萬黼	長生	長華	赛音察浑	承庆	承祜	承瑞	第十九子	第十七子	第十五子	第十三子	第十一子	第九子	第七子多罗贝勒	第五子多罗贝勒	第三子多罗贝勒	皇太子	第一子多罗直郡王	第四子多罗贝勒	第六子	第八子多罗贝勒	第十子	第十二子	第十四子	第十六子	第十八子
幼龄	幼龄	幼龄	幼龄	幼龄	幼龄	幼龄	幼龄	幼龄	幼龄	胤禝	胤礼	胤□	胤祥	胤禌	胤禟	胤祐	胤祺	胤祉	胤礽	胤禔	胤禛	胤祚	胤禩	胤□	胤祹	胤禵	胤禄	胤祄

第二点，皇十五子胤禑的第二个字误书为□，和列在胤□左边一个“幼龄”的名字完全相同（见上表）。

六、冯、杨的分歧和未决问题

笔者已将冯尔康和杨启樵所使用的康熙朝玉牒予以较详细的解剖和考订；并且指出康熙朝玉牒作为解决允禵易名问题是最权威的史料，其文本之中也存有不少问题。笔者现在试图利用考订的结果来化解冯杨二氏对允禵“复名”的歧见；并进一步对他们遗留“未决”的问题提供答案。

笔者首先必须把“复名”的定义予以澄清。严格说来，冯尔康如果要证明允禵是他原名“胤禵”的“恢复”（“复名”）使用，就必须先证明雍正曾经先给他把“胤祯”改回他的原名“胤禵”，然后再把他原名的第一个“胤”字像其他兄弟一样改成“允”而成为“允禵”。也就是说，他的改名实际上是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恢复康熙三十六年版玉牒上的原名“胤禵”，第二步是将“胤禵”像其他兄弟一样“易名”为“允禵”。换言之，其他皇子只是一次“易名”；而十四子是先有“复名”然后又有“易名”。这一个环节非常关键，因为如果十四子的改名缺少这个中间步骤，而是把“胤祯”先改成“允祯”，然后再把“祯”字改成“禵”而得到“允禵”之名；那么这个“允禵”就不能算作他的“原名”，而是从“胤祯”直接改成的“新名”。这样“允禵”只能是算是“易名”，而不能算作“复名”。

笔者把康雍二朝的几个玉牒版本考察对比后，显示十四子易名为允禵前应当是先经过第一步的“复名”步骤。试简述史料的根据如下：

1．笔者把雍正二年版的直格玉牒上康熙诸子的名字和康熙四十五年直格玉牒加以对照，发现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变更。另外雍正十一年版（实际补修完成的时间是乾隆元年）帝系玉牒上康熙诸子的名字和康熙四十五年帝系上皇子的名字也完全相同（只有第八子胤禩和第九子胤禟的名字因为被“除宗”而被剔除）。例如康熙四十五年版和雍正十一年版玉牒上第一、三、五、十四子的名字都是胤禔、胤祉、胤祺、胤禵；依此类推。

2．这个现象就证明胤禛即位后他和康熙诸子的关系改变了，是从“兄弟”变成“君臣”的关系了。因此诸兄弟按照中国帝制的“避讳”传统把名字的第一个字“胤”改为“允”（唯十四子例外，下面有解释）。但是这些因避讳而改成的新名只适用在雍正朝的上谕和一般编纂的官书上（包括圣祖实录）；至于他们的原名在雍正朝增修的玉牒里（雍正二年和十一年版）并未因避讳改名而予以改变；当然更不会把康熙朝的玉牒上的原名予以更改了（所以“改抄”是不可能的）！

这个制度和雍正朝所纂修的《清圣祖御制文集》一样，因为《文集》是乃父康熙的私人著作而非一般官书，所以其中提到康熙的儿子，如雍亲王胤禛和皇十四子胤祯等人的名字时，都和玉牒上的名字是一致的。

再回到十四子胤祯改名的经过。因为他的名字在雍正二年的玉牒上仍然是“胤禵”而非“允禵”，而且因为玉牒上的名字是根据宗人府的黄册才把他更改了的名字纂修入雍正二年的玉牒里，这就意味说：他在雍正登基后必然已经把他的名字从“胤祯”改回原名“胤禵”并且记录在黄册[①]上了。以后他的胤禵之名才和诸兄弟一样为了“避讳”把“胤”改成“允”而成为

---

① 根据康熙五十二年七月壬子（初七日）题准关于修改玉牒的定例（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55）：“被革退的宗室”俱应给以红带，然后把他们的名字“记黄档内”，等到“纂修玉牒时一并载入”。也就是说：其载入的手续包括（1）把将他们的名字首先重新“补入黄档内”（附在黄档后面），（2）然后才能把他们的名字“载入玉牒”（也是附在玉牒后面）。这个关于玉牒“增改”的定例也佐证了：十四子恢复原名时必定也是先在“黄档”内改回原名胤禵后，才能把胤禵这个名字“载入”雍正二年版的玉牒里。

“允禵”。所以十四子“允禵”之名必是先经过“复名”而后再为了避讳而“易名”为“允禵”。

冯尔康使用“复名”一词时似乎就根据一个假定：这个中间步骤实际上是暗含在“复”的程序里；当然杨启樵也并没有考虑到这一个细节来强化他的观点。

杨氏和冯氏在“复名”上歧见的原因，正如杨氏所说，实在是“怎样判断史料”的基本问题。也就是玉牒是不是“改抄（本）”的问题。因此，笔者现在必须讨论玉牒是否可以遵照纂修实录的凡例而把“胤祯”一律“改抄”为“允禵”的可能？

第一，我们先来看看雍正《大清会典》中雍正元年一道关于“纂修”玉牒的上谕：

> 雍正元年题准：玉牒事属重大。定例：宗室觉罗所生子女，每年载入黄册红册。俟满十年，纂修玉牒，兼写清汉文。该衙门除府丞外，并无汉司官，每年只有清文册籍。嗣后增设汉主事二员，将进士、举人出身官员，交该部拣选引荐补授。于每年各宗室觉罗开列送府时，即兼清汉文造入册籍。

另外，同页还有一道谕旨说：“［雍正］三年覆准：玉牒馆局，凡校对缮写汉文，交与府丞总理。”①

这里我们看到（1）康熙朝每十年所纂修的玉牒都是“兼写清汉文”；证明康熙朝的玉牒应当有满汉两种文本；但是（2）宗人府的“册籍”（黄册和红册）却“只有清文”；因此雍正元年增设这些“汉司官”的目的是他们可以登记皇帝子女时不止登记满文册籍，也要登记汉文册籍；这当然也包括翻译的责任；（3）在雍正三年以前，编纂玉牒时没有专门“总理”“校对”和“缮写汉文”的官员。因此玉牒文本中误写和误译的情况无可避免。乃是从雍正三年开始宗人府才把“校对缮写汉文”纳入府丞（正三品）的权责范围里。②

这里所提到的“定例”是指在康熙朝每十年增修新版玉牒（如康熙四十五年版）前“十年”中，每逢康熙帝生了儿子或孙子都必须把他们的名字送到宗人府的“黄档房”登记在那里的“黄册”上；但是没有明言这个“定例”是从康熙朝哪一年的玉牒版本纂修时开始的，比如康熙九年或十八年是否已经遵守这个“定例”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我们知道康熙朝的政治制度的汉化是逐渐加强的。第一部的《大清会典》是到了康熙二十九年才公布的。宗人府的职责（包括纂修玉牒）也是从这一年才纂入清廷这一个最高“行政法典”之内。所以“定例”的“开始”运作的年代是一个关键问题。

这里明言，康熙朝的“册籍”（黄册和红册）上登记的康熙帝子孙的名字都是以“清文”（满文）写的（“只有清文册籍”），因为宗人府的“司官”都是“满缺”，不给汉人担任。增设汉司官的目的，是要他们可以于每年宗室新生子孙的名字送到宗人府时，就把他们的名字也用“汉文”登记入籍；只是到了雍正元年，宗人府才开始有汉文的黄册。而且乃是从雍正三年开始，每逢纂修玉牒时，一切校对缮写汉文的工作都授命宗人府的“府丞“（康熙朝都是由汉军担任）“总理”其事。这也说明在雍正三年以前对“汉文”的“缮写”和“校对”并没有总揽其事的人。此前增修玉牒时是各从其政，互不协调。这无疑是造成误写误译的重要原因。

---

① 允禄等：雍正《大清会典》，卷1，宗人府。

② 康熙虽然大力推行汉化，但是这主要是应用在外朝的政治环境里，不适合内廷皇帝家里的“环境”。而且玉牒只是皇帝的“家”谱，在文字上当然要以身作则采用“国语”而不用“外文”（汉语）。康熙和皇子们谈话必然要用“国语”。就是在建立皇储的问题上，康熙的脑子里也是认为那完全是他“家庭”内部的私事。例如康熙五十七年二月朝臣议论建储时，李光地力抗“异议”，康熙接到报告后“叹曰：大臣中每事为我家计万世者，独此老臣耳!”（见李清植：《李文贞公年谱》，卷下。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21册，文海出版社，1966年）。在康熙心目中，建储完全是“我家”的事！相对的，那个自作多情的王掞就是没有认清这一点，使他不但碰了一鼻子灰，还遭到被充军的惩罚（因为年岁太老，只好由他的儿子替他去受罪!）。这个“崇国语”和“家”天下理念是满清政治文化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管理皇室“家”务的宗人府里官员的任命也同样反映这个“家”的重点。

玉牒编纂是皇帝的家事。所以开头只有满文册籍是符合当时“崇尚国语“（即满文）的国策。对皇室来说是一种“以身作则”的运作。但是自从康熙决定采取汉制用汉文为皇子“起名”（原名），而增修玉牒时因为要求“兼写清汉文”两种，所以要想把“新生子孙”的名字“增”添到新版的玉牒上，自然必须根据“黄册”上登载的新生皇子和皇孙的资料。何以如此呢？因为新版玉牒（如康熙四十五年版）中所需要“非新生”子孙的名字和履历等资料都可以根据上一届的玉牒（如康熙三十六年版）照抄即可，这应当是正常的做法。①

但是在增修四十五年版直格“皇孙”部分的玉牒时，编纂人员就不能照抄三十六年版本上的资料，因三十六年后“新生”的皇孙之名不在那个版本上面；必须直接根据“黄册”中的“新资料”（只有满文）去抄写。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满汉互译”的关键问题。开头皇子皇孙的“原名”是汉字（如十四子“胤祯”）。等到他的名字登记在黄册上的时候，宗人府的“满司官”就把汉名“音译”成满文，登记在黄册上。这是“汉文”音译成“满文”的第一次翻译。等到康熙四十五年把这些皇孙的名字“增”修到新版的直格玉牒的时候，如果是抄到“满文”本的玉牒上，只要照抄满文即可。但是当满司官把他们的满文名字转抄入汉文玉牒时就必须再把他们的名字“音译”成汉文；这是第二次的翻译，是满文“翻回”汉文。在这种情形下，因为满文常常没有准确的汉文对音，特别有的汉字发音，如“祯”和“禛”这两个字的发音，连汉人都常常弄得 zhen 和 zheng 不分（何况禔 ti 还有 3 种汉文发音，zhi、ti、shi），满司员在康熙四十五年的皇孙直格玉牒里把满文的 zheng，本来应当翻成“祯”，但却误译为“禛”。这种错误的发生才真的是“实属易易”了！下面再着重探讨几个问题：

（一）改抄玉牒问题

解释了康熙四十五年汉文直格（皇孙）玉牒中把“胤祯”误写为“胤禛”的原因后，我们来看看康熙朝玉牒是否经过“改抄”的问题。我们特别要看看雍正皇帝能不能“偷偷摸摸”地去皇史宬把玉牒“篡改”或“销毁”？

即使皇帝自己要看玉牒也需要经过隆重的仪式；不是他什么时候高兴就可以拿着钥匙到皇史宬开门随便翻阅的。②

另外，每届纂修玉牒都要临时设立玉牒馆，其编修人员都是从中央机构抽调。一史馆的宗人府档案里没有康熙朝玉牒馆的资料，但乾隆三十三年宗人府一份档案可供参考。这是一份宗人府于玉牒编纂完成后为参与编纂的人员圆满完成工作而向皇帝“请旨议叙”的档案。那次参与玉牒编纂的人数共有 150 人之多。包括：总裁（2 人）、副总裁（4 人）、提调官（1 人）、纂修官（7 人）、汉纂修官（5 人）、收掌官（8 人）、满誊录官（28 人）、汉誊录官（8 人）、供事（17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著名满文专家屈六生先生在《清代玉牒》（见《历史档案》，1984 年第 1 期）一文中指出：“清初局势复杂动荡，统治未稳，清廷对于汉官，不敢轻信，其前期重要文书，俱用满文书写，不准汉官参与。修玉牒也是如此，故顺治、康熙两朝所修玉牒，仅有满文。雍正元年，才批准增设汉主事二人，于进士内遴选，经皇帝引见后，补授职官。以后每年宗室觉罗子女开列送府时，即以满汉两种文字造入册籍。该文章说：（1）“前期重要文书，俱用满文书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根据不同情况，大部分发给政府机构的谕旨还是有汉文本，甚至以汉文为主。（2）康雍两朝所修玉牒也都不是“仅有满文”，因为一史馆就有康雍两朝的全部玉牒（康熙五十四年版不存在）汉文版（除非证明这些都是雍正朝“补抄”的，事实上不可能，理由见后）。笔者于 2011 年 10 月曾和屈先生做过一次长谈，他说他们翻译康雍朝满文朱批奏折时所用的是“小本玉牒”（笔者看到的是“大本玉牒”），而且他谦虚地说：“我们看的没有你那么仔细”。因此他们没有注意到上一节对于玉牒鉴定中所发现的问题。

② 康熙帝要求宗人府把玉牒（应当是康熙四十五年版）送入大内，这也需要经过隆重的仪式。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五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庚戌，中华书局，1984 年。

人）、帮写清书（34 人）、帮写汉书（28 人），以上共 142 人；另有纸匠 3 人，皂隶 5 人。①

这份档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纵然从事康熙朝纂修玉牒的工作人员的人数不会有这么多，但是也绝对不会是只有几个人。就只算裱糊等技术人员的工作，也绝不可能由皇帝单枪匹马去从事修补篡改的勾当。

但是，笔者 1980 年在一史馆看到康熙朝最早期的两个玉牒版本（康熙九年和十八年）应当是雍正朝补抄的。理由如下：

（1）笔者发现康熙十八年的汉文玉牒里皇四子胤禛的名字是黄色（或即“黄签”年代日久而腐化后仅呈黄色？我的笔记上用英文写了一句问语：“Why yellow?”［为何是黄色?］）这个现象符合圣祖实录编纂的规律，就是把当今皇帝雍正的原名用黄签遮盖。② 因此笔者认为是雍正朝补抄的。否则，如果是康熙朝的玉牒原本，“胤禛”的名字应当和其他兄弟一样不加黄签。

但是雍正元年的谕旨不是说按照“定例”康熙朝“纂修玉牒，兼写清汉文”吗？怎么可能没有康熙九年和十八年的汉文版原本呢？解释有二：

一、雍正元年的上谕似乎也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因为康熙朝的“定例”从何时开始，在这个“题覆”里没有说明。这里的重点在于“以后”应当如何，而不重在“以往”定例开始的时间。笔者推想是这样：宗人府根据雍正元年新的定例，当然在以后抄录黄册和红册时都必须是兼写清汉文。但是很可能宗人府为了使康熙朝的册籍和玉牒完整配套，就索性也把康熙朝缺少的汉文黄册（和红册）也同时补抄了。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在补抄黄册的同时，宗人府也连带着把页数不多的康熙九年和十八年的汉文玉牒补抄了；只有这样，在康熙十八年的玉牒中胤禛的名字才需要黄签遮盖。（康熙九年玉牒中没有胤禛之名，故只有十八年版才出现这个现象）。换言之，四子的名字不改，但需要“黄签遮盖”。

二、如果我们把这个模糊点放在康熙朝政治制度汉化的过程里来看，也许就能看得更为清楚。清政权在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后才完成了帝国领土的统一大业。五年后，康熙二十五年，为进一步强化汉制，康熙谕令廷臣参考《大明会典》纂修自己的《大清会典》；纂修工作于康熙二十九年完成，是为清朝的第一部指导清廷政治运作的最高行政法典。

在这种强化汉制的文化环境里，康熙二十七年以后的玉牒开始采取“兼写清汉文”应当是符合会典规范的。但是在此以前，康熙九年和十八年的玉牒版本很可能是和黄册一样仅有满文本。现在因为《大清会典》的规范，以及康熙预立皇太子制度的缘故，就把前两届的玉牒的汉文版本也补抄了。

（二）胤禵康熙四十五年玉牒更名的问题

第一，杨启樵问：胤禵改名为何不照胤禔改名在玉牒里特别注明？解答如下：要想使皇室内部的运作符合《大清会典》的规定，皇子的命名也需要向皇太子（未来的皇帝）看齐，就是照着胤礽名字的格式来命名和更名。这个也就是康熙三十二年颁布宗室“更名”谕旨的背景：据雍正《大清会典》“康熙三十二年覆准，王以下闲散宗室以上，有同名者俱令更改。内有已得诰册者交部换给。照所改名修入册籍。”③

这个规定虽然是针对“同名”问题，但是显然也是对皇子中名字的不一致的更正。皇长子保清是康熙三十二年更名定例颁布时唯一的一个没有向胤礽的名字看齐的皇子。按年龄来说比胤礽年“长”，但是在帝王体系里却较胤礽为“卑”；因此他在康熙三十六年玉牒里改名为胤禔需要特别注明。

---

① 一史馆藏《宗人府档案》：王字一百四十七号，乾隆三十三年五月《说堂稿》。

② 参见吴昌绶《清帝系后妃皇子皇女四考》中“帝系”载“世宗宪皇帝讳胤禛”条后面注：“各依玉牒粘黄签例，帝讳谨加边栏。”

③ 允禄等：雍正《大清会典》，卷 1，宗人府。

至于胤禵康熙四十五年汉文玉牒改名胤祯只是根据“长幼”的定例，和其他宗室成员一样，不需要特别注明。

第二，康熙四十五年玉牒为何出现“胤禵”和“胤祯”并存的现象？即十四子的名字在该年满汉文玉牒上都是“胤禵”，唯有在满汉文直格（皇孙）玉牒上是新名“胤祯”？（而且“祯”误写为“禛”，如前述）。解释如下：康熙朝玉牒馆负责编修玉牒的人员都是从中央部门临时抽调来的，而且没有统筹监督玉牒文本“校对”的官员（见前引雍正《大清会典》三年谕旨）。根据清制，每次续修玉牒时“例以宗人府藏上届玉牒之副本为底本，进行增补填注”。① 这可以解释本年玉牒中“胤禵”的由来。唯独“直格（皇孙）”部分是直接从满文黄册上抄录。因为十四子胤禵首次于康熙四十二年生一子，名弘春，而登记黄册（黄档）时，弘春之名必须系在乃父新名“胤祯”（满文）之下。但是因为抄录人员互不协调，才出现“禵”和“祯”并存的现象！笔者在查阅康熙三十六年汉文玉牒时，发现玉牒最后面小纸条上面写着“康熙三十六年黄档四号”字样，这个纸条是三十六年满汉玉牒都是根据那一年的满文黄册（黄档）的文证兼物证。

第三，胤禵为什么没有根据康熙三十二年的规定在康熙三十六年的玉牒上和胤禔同时改名，而仍然保持“胤禵”之名不变呢？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皇子在“成年”（15岁）接受“封爵”以前，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政府的文件里。试想十四子出生于康熙二十七年，康熙三十二年更名定例颁布时他才6岁，他的名字不可能在皇帝的上谕和封爵诏书中出现。当他15岁（康熙四十二年）达到受封年龄时，礼部才可能发现他的胤禵和皇长子的胤禔在汉文发音上可能产生混乱的情况。康熙四十二年的请安折上胤禵的署名变成满文的“胤祯”，也说明他16岁前已经更名而且和他成年有关（康熙四十二年他已经16岁）。②

第四，杨启樵提问说：为什么礼部为胤禵易名时取了和“胤禛”类似的“胤祯”？笔者认为这是因为：

（1）祯和禛二字在汉文里形和声都不同。根据《康熙字典》，胤祯的发音是 yin zheng；胤禛是 yin zhen。在满文也是。（至于胤禛继统后十四子又改“祯”为“禵”又当别论，详见下文。）

（2）“祯”字在康熙崇敬的经书《中庸》里面的语境是“国家将兴，必有祯祥”。何况十三子胤祥的名字已经包括“祥”字，把十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名字里的“祯”和“祥”连起来是“国家”的双“福”（祯和祥都和“福”有关）。礼部取用此字自有道理。那时他们兄弟间还没有“朕躬”与“国家”的考量。

（三）胤祯改为允禵问题

冯尔康和杨启樵都有疑问：为何胤祯不像其他兄弟们一样只改“胤”为“允”，而还必须也把“祯”改为“禵“呢？这里试解答如下：

（1）这两个汉名如果只涉及在玉牒上的记载，他们在皇帝家里都是以“四阿哥”和“十四阿哥”称呼，没有问题。而皇帝在外朝向廷臣所发的上谕和诏书等官文书里，也只是显示它们的“形”（写法）而没有“声”（口语）的问题。但是等到胤禛继统而关系变为“君臣”时，就产生了一个“避讳”问题。如果“形”或“声”和皇帝的名字过于近似也构成“改名”的根据！

（2）如前述，“祯”和“禛”在字“形”和字“音”上在玉牒里和起居注上都出过差错。

---

① 鞠德源：《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见《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88 年，第 412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奏折全译》，第 544 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96 页。胤祯和其他 8 位兄长于康熙四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用满文缮折，向康熙报闻十八阿哥病逝。这时已用“胤祯”（满文）这个名字了。

（从十九纪以来的野史和学术性的著作中将两个字混为一谈的例子在在皆是）。“祯”和“雍正”的“正”字是同音（不同声），很容易把“允祯 yunzheng 读成“雍正 yongzheng”。试想如果雍正帝责骂他的十四弟说：“允祯素来昏庸”时，其中的“允祯”和“雍正”的发音几乎难以辨别，那他不就是自己骂自己吗？

这个顾虑我们从学界常引用的《皇清通志纲要》可以找到佐证。该书的一条记录说：“［四十七年］九月，以八皇子先考管内大臣内务府事。九月，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圈禁。先考八皇子同顺承王，因张明德案拿交议政讯奏闻。宽恕革爵。”① 请注意：弘旺提到胤禔和胤祥时都是按着正规写成“皇长子“和“皇十三子”的形式，就是把“皇”置于排行数字之前；唯有轮到乃父胤禩（“先考”）时，他把次序颠倒过来，而写成“八皇子”。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父亲的名字写成“皇八子”就很容易发音成“王八子”啊！

结　语

对于持“窜立说”学者来说，他们多年来极力试图利用皇十四子允禵原名胤祯的错误观念去证明雍正继位是从胤禵手中篡夺而来的。他们试图从众多次等中外史料中去发现十四子“允禵”在康熙朝的原名是“胤祯”，并且利用这个“发现”来支持其雍正窜立皇统的说法。这只不过是因他们没有看到玉牒这个最权威的史料而做出的错误结论。

对于雍正继统同持“合法说”的冯尔康和杨启樵而言，他们因为利用最权威的史料——玉牒——而对允禵易名问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在史料运用方面与认识上亦有得失。

冯尔康在他的文章里首先引述了《皇清通志纲要》上几段关于允禵易名的文本后说：这些文本“似有深意”。但是他并没有说明其“深意何在”。相反的，持窜立说的学者们之所以一再引用这一次等史料的原因正是因为在他们猜测其中“确有深意”。经过这次的史料鉴定和批判，笔者认为那些文句都“毫无深意”。

冯尔康的“复名”说实际上必然包含了两个程序：（1）首先雍正必定先在宗人府的黄册上让胤祯改回原名“胤禵”（不然雍正二年的玉牒上的名字不可能是胤禵，因为玉牒上的名字是根据黄册的）；然后（2）第二步让他和众兄弟一样把“胤”改成“允”而成为“允禵”。如果是这样，他的“允禵”之名是先经过“复名”再经过“易名”而得来的。换言之，十四子和其他兄弟“一样”：都是把“原名”里的第一个“胤”改为“允”成为“允禵”（胤祯不是他的原名！）。冯氏的“复名”的定义似乎只注意到胤祯更名为“允禵”这个“事实”，而没有意识到这一个改名“程序”中的中间步骤。

杨启樵在雍正继位的大问题上和冯氏看法相同，否认允禵易名和雍正继位有任何关联。但是他在说明他和冯尔康在“复名”上发生分歧的同时，也显示了几个弱点：

第一，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杨氏竟然引用了非法派最爱引用的《皇清通志纲要》这一个次等史料来证明十四子“原名”是胤祯，不是胤禵。这显示了他对史料的鉴定和使用不够一致。

第二，为了加强他的论点，杨氏更进一步主张冯尔康的“复名”说所根据的康熙朝三十六年和四十五年版的玉牒都是雍正朝“改抄”的而非原本，但他没有提供任何可信的证据。反而像孟森一样，他利用了一些“我想”、“可能”的词句，还加上类似现场直播式的“想象情况”，以及他对于雍正曾经把关于允禵易名的史料予以“销毁”的说辞，统统缺少可信史料的根据。

第三，杨氏认为雍正可以命令宗人府把康熙朝三十六年和四十五年版的玉牒全部“改抄”似乎显示他对玉牒的编纂“制度”有欠了解。允禵（和他的兄弟们）在雍正朝因为避讳而更名并不涉及到“其前”康熙朝玉牒上的皇子们的“原名”。甚至也不影响到雍正朝玉牒上康熙诸子

---

①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卷 4 下。

的原名。雍正二年和十一年玉牒上康熙诸子的名字和康熙四十五年玉牒上的名字完全一样，并没有把“胤”改为“允”。这是因为皇帝的“家谱”和皇家私人著述（文集）上的记录不受外朝公文程式的规范。如前述，康熙朝的玉牒如果有变动，只有把没有的进行“补抄”的可能，没有“改抄”的可能。

以上是笔者针对“允禵更名”这一个“标的问题”对“篡立说”学者引用“次等史料”的批判；也是为“合法说”学者（冯尔康和杨启樵）之间对“允禵”更名“分歧”上的几个疑难和“未决”问题提供了一些合理的答案，以供新生代的研究者参考，以推动雍正问题的进一步的研究。也期待同行学者对本文中任何错误惠为指正。

主要参考文献

[1] 冯尔康：《康熙十四子胤禵改名考释》，《历史档案》1981 年第 4 期。
[2]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五石斋抄本。
[3] 金承艺：《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
[4] 李清植：《李文贞公年谱》，见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21 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
[5]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6] 屈六生：《清代玉牒》，《历史档案》，1984 年第 1 期。
[7]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78 年。
[8] 杨启樵：《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
[9]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年。
[10] 王钟翰：《王钟翰清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 年。
[11] 允禄等：雍正《大清会典》，卷 1，宗人府，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77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5 年。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The Change of Yin-ti's Name and Emperor Yongzheng's Succession to the Throne

Silas Wu（Boston College；silaswu@gmail.com）

The legitimacy of Emperor Yongzheng's succession to the imperial throne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among Qing historians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ose scholars who hold the view that his 14th brother was originally the designated heir by Emperor Kangxi, but Yongzheng usurped the throne through devious means. One version of the "usurpation theory" is that Yongzheng had first stolen his 14th brother's name and made it to be his ow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abricated a new name——Yun-ti——for his 14th brother in order to cover up the illegitimate nature of his throne. However, their findings are altogether erroneous because they failed to find out the 14th brother's name from the *Zongshi Yudie* (Genealogy of the Imperial House).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 who hold the view that Yongzheng's throne was indeed legitimate and the change of names among his brothers was simply a traditional practice under the imperial institution. They identified the original name of the 14th brother from the *Zongshi Yudie*.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be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used by both sides of the scholars.